

非遗如何被记忆：人工智能时代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媒介演绎

何 韡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8月4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1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8日

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无实体承载的历史见证与文化符号，其活态性根植于“人”的社会实践，成为联结过去与当下的记忆纽带。然而，非遗的存续始终面临着一个悖论。作为活态记忆，它依赖身体、口头与代际交往得以传递；但恰恰是这种依赖性，使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极易断裂与消逝。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非遗的记忆建构与传承，推动非遗记忆从身体依存转向数字活化，为非遗的存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基于此，核心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如何重构非遗记忆的存续逻辑？非遗记忆的主体、媒介与过程发生了什么变化？为回答这一问题，研究首先从记忆研究的视角出发，界定非遗记忆的分析框架，进而沿着记忆的过程，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于非遗记忆的创新转化与演绎。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转化并非单向的进步叙事。人工智能在挽救记忆的同时，也在重构乃至简化记忆。因此，在承认人工智能赋能潜力的同时，亦须揭示其可能带来的文化简化与主体消解风险，进而探讨如何在技术逻辑与人文价值之间寻找一条负责任的非遗记忆传承路径。

关键词

人工智能，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记忆

How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Remembered: The Living Transmission and Media Interpretation of ICH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i He

School of Art and Media,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August 4,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8, 2026

Abstract

As historical testimonies and cultural symbols without physical carrier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derives its living nature from human social practices, serving as a mnemonic bond that connects the past with the present. However, the survival of ICH has always been confronted with an inherent paradox: as living memory, it relies on bodily practice, oral transmiss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for its perpetuation—yet it is precisely this dependency that renders it highly vulnerable to disruption and disappearanc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are reshaping the memory constru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ICH in unprecedented ways, driving a shift in ICH memory from bodily dependence to digital revitalization, and thus opening up new possibilities for its preservation. On this basis, the core question is: how do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construct the logic of ICH memory's survival? What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the subjects, media, and processes of ICH memory?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this study first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ICH mem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studies, and then, following the trajectory of mnemonic processes, examines the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ICH memory enabl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It must also be noted that this transformation is not a unidirectional narrative of progress—whi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alvages memory, it simultaneously reconstructs and even simplifies it. Therefore,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empowering potenti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tudy also reveals the risks of cultural simplification and subject dissolution that may ensue, and further explores how to navigate a responsible pathway for ICH memory transmission that balances technological logic with humanistic value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Mem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无实体承载的历史见证与文化符号，本质是活态流变的文化记忆。非遗之所以能勾连起人们的归属感，正是因为对其文化意义的认同，进而确认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身份标识。可以说，非遗记忆承载着历史与文化，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使过去“保鲜”，也使民族和文化得以延续与再发展，在构建特定文化认同和记忆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与物质遗产不同，非遗并不依赖某种固定不变的实物“本体”，其存续从根本上系于“人”的社会实践与代际传递，这使其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活态记忆纽带。然而，非遗的存续也因此始终面临一个内在悖论：作为活态记忆，它依赖身体、口头与代际交往得以传递，但恰恰是这种对身体与具体情境的依赖，使其在现代化进程与代际更替中极易断裂与消逝。

随着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新兴技术迭代和升级，数字媒介与传统人文的联系愈发紧密，催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态和活态化，为其数智化表达奠定了基础。当前，以 ChatGPT、Sora、DeepSeek 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凭借其“数据巨量化、内容创造化、跨模态融合、认知交互力”[1]等核心特性，正深刻改变着非遗的传承与传播方式，使非遗记忆的书写得以突破传统时空界限，其形态也不再局限于物

质层面，向数字化、虚拟化和交互化方向拓展，成为新时代下非遗传承与传播的时代趋势。

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回应了这一困境。一部分学者聚焦于非遗数字化保护本身的技术路径，探讨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如何为文化资源的采集、著录与再利用提供支撑[2]；另一部分研究则将视野转向数字与智能技术介入后非遗的传播机制[3]。与此同时，记忆研究自身也在经历一场“数字转向”。随着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数字记忆、连接记忆等概念对经典文化记忆理论的补充与挑战[4]。不过，现有研究多集中于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技术实现，或聚焦传播效果与身份认同这一结果层面，对人工智能如何介入非遗记忆的建构过程、进而重塑记忆的主体、媒介与传承逻辑这一更具纵深的问题，尚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

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从非遗记忆的角度出发，追问人工智能作为新型媒介，其技术特性如何被创造性运用于非遗记忆的当代转化与创新演绎？在这一过程中，非遗记忆的主体、媒介与传承过程发生了什么变化？为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首先界定非遗记忆的分析要素，进而考察人工智能介入后这些要素如何被重构与运用，即人工智能对非遗记忆的创新演绎，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这种数智化转向所内蕴的矛盾，以更好地构建以人文价值为导向的非遗智能演绎方法论，使技术真正成为激活文化生命力的创造性媒介。

2. 作为记忆的非遗：主体、媒介与传承过程

记忆是人类在过去经验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能力与结果，它不等同于客观的历史记录，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心理与文化现象。记忆既存在于个体的大脑与身体之中，也流动于社会的交往与仪式之间，更凝结于文本、器物与空间之内。在关于记忆的诸多理论中，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颇具解释力。它区分了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并将后者的传承方式作为考察重点。交往记忆是日常、口头、代际间的活态记忆，文化记忆则是借助文字、经典、仪式、建筑、神话固定的、关于过去文明的集体知识，用以维系文化身份与连续性。在扬·阿斯曼看来，文化记忆的传承主要通过仪式关联和文本关联两种方式实现，前者是指族群内通过仪式化的行为和身体实践来传递和强化文化记忆，后者则是通过经典文本与符号的书写、阐释和注解来实现文化记忆的传递。这也为我们理解非遗传承提供了重要视角。非遗作为典型的文化记忆载体，既包含了仪式关联的身体实践，比如舞蹈、吟诵等；也包含了文本关联的符号表达，如典籍记载、图案纹样等，这两种方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记忆生态系统。

要进一步理解非遗记忆，首先要回答谁的记忆这一问题，也即记忆的主体。通常认为，传承人是非遗的直接传承者，其身体记忆中承载着默会知识与手感经验。但非遗记忆除了个人的记忆，还更强调其整体的范畴，是归属于更广泛的社群的记忆，往往被一个村落、一个族群乃至一代人共同铭记与传颂。也就是说，非遗记忆的主体是广泛的，既是个人层面的，也是整体层面的，可以理解作为一种主体嵌套结构。不过，非遗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某项技艺的稀有，某种记忆可能只有特定且少数的传承人才享有，在这种情况下，非遗的个人记忆就尤为重要。不同主体之间的记忆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传承人的个人记忆与社群的共同叙事之间、老一辈与年轻一代的感知方式之间，都构成了非遗记忆内部的动态张力。

从非遗记忆的媒介演进层面来看，经历了从身体、口头、器物、文字、影像等多重承载方式的演变。在最原初的意义上，身体是记忆的第一媒介。舞者、工匠、仪式参与者等身份所要求具备的技艺，都以身体作为存储与传递的载体。而非遗作为活态的文化记忆载体，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既需要身体的亲身实践，又离不开符号系统的支撑。借用德里达的广义文本概念，非遗不应被窄化为文字记录，而应被视为以身体为媒介的活态文本、以言语为介质的口头文本以及以器物为载体的物化文本。比如一位剪纸艺人的技艺传承，既是手指肌肉记忆的重复训练仪式关联，也是特定纹样符号系统的传递文本关联，前者体

现在“剪”的过程，后者体现在“剪”的结果。那么这样一来，艺人的身体是流动的文本，工具材料是物化的文本，创作过程则是行为的文本，整个非遗本质上即可视为一个多维度的意义网络。而这种记忆媒介的多元性，也决定了非遗无法被任何单一媒介技术完全“格式化”。

从非遗记忆的传承过程来看，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态流变的权力过程。非遗记忆并非一成不变，是在不断的社会激活中被当代文化重塑，蕴含着激活、重构、遗忘与争夺的博弈。具体而言，激活是非遗记忆得以重获生命力的起点，重构则是非遗活态性的核心表现，传承人在复现传统的同时也注入自己的理解与时代的印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有意识地选择性记忆，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被迫遗忘，这种创造性遗忘往往也是记忆重构的一部分。再者，由于不同话语力量的介入，非遗记忆的阐释权也时常面临争夺，比如哪些版本将被纳入官方名录、以及具体呈现上是恪守传统，还是顺应大众审美等，都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

人工智能的介入，则标志着非遗记忆进入了一个数智中介化的新阶段。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深刻改变非遗记忆的存续逻辑，使记忆的中介化过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媒介演化的进程不是替代的关系，而是通过层层拓展的方式，拓宽了文化表达的边界。比如书写媒介虽然能保存非遗技艺的流程，但却难以复现身体的韵律；影像记录虽然能够留存动态画面，但依旧没有办法传递触觉经验。然而，非遗得以活化和传承的核心矛盾，又恰恰在于其动态性、实践性与情感性难以被传统媒介所完整承载。毕竟，某种媒介对文化的转化都是在其媒介技术逻辑运作中完成，必然带有技术的影子，而要使非遗文化能更深层次地被人们所感知，媒介技术逻辑与人们感知上的逻辑必须更大程度上地接近。也就是说，要使文化传递更有效，媒介技术逻辑与人类感知逻辑的契合度是核心。技术再先进，如果不符合人的感知习惯，文化传递就会失真。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技术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记忆的转化器。要让媒介真正激活非遗的文化基因，就必须让技术运作方式贴近人类感知世界的本质方式。人的感知是一种具身的、情境的、情感化的体验，正因如此，非遗传承的核心不是信息传递，而是“体知”，即是通过身体实践和文化沉浸，而形成的默会知识。非遗媒介要贴近这种感知逻辑，就要营造能呼应情感、激发具身参与的共鸣感。非遗记忆的传承与演化，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它从原生文化语境中不断向外迁移，在跨媒介传播中发生意义流变，并在新的时空语境中被反复唤醒重构。而这一过程在人工智能影响下，包含了三个层层递进的环节——脱域化、重组化与激活化，分别对应非遗记忆的载体形态、叙事结构与传播时空场域的转变。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主体、媒介、传承过程这一静态分析维度，与脱域化、重组化、激活化这一动态过程，并非彼此平行、互不相关的两套框架，而是同一记忆现象在不同观察层面上的呈现。前者回答的是“非遗记忆由谁承载、依托何种媒介、经历怎样的博弈过程”，后者回答的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下，这些静态构成要素本身如何被改写”。具体而言，脱域化改变的首先是媒介维度，非遗记忆得以脱离身体、口头与在地场景，转存为可独立传输的数字信息，这使得原本以身体和器物为核心的记忆媒介被数据、算法与云端平台所补充甚至部分替代；重组化改变的则主要是主体维度，当记忆素材被拆解为可调用的数字碎片后，重新组织与串联记忆的权力便不再为传承人所独享，公众与智能系统得以介入符号解码与再编码的循环，原有的主体嵌套结构由此被重塑为传承人、公众与智能系统协同参与的结构；激活化改变的则主要是传承过程维度，记忆的激活、重构、遗忘与争夺不再仅仅发生在仪式现场与代际之间，而是延伸至虚拟场景与算法推荐的持续互动之中，使记忆的博弈获得了新的时空场域。也就是说，脱域化、重组化与激活化是人工智能作用于这三个静态维度、使其发生形态转换的具体机制。脱域化主要作用于媒介，重组化主要作用于主体，激活化主要作用于传承过程，三者共同构成了本研究后续章节展开分析的理论脉络。

3. 记忆的脱域化：非遗从身体到数据的载体迁移

非遗记忆的根基在于构建，而构建的过程必然依托于媒介载体。没有媒介，记忆便无从附着、无法流动、难以传承。当记忆从身体、在地迁移到数据与云端，非遗的存在形态正在经历转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讨论现代性时提出“脱域”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互动情境中被抽离出来，在不确定的时空跨度上重新组合的过程。这一概念最初用于分析现代制度如何将社会关系从传统的地域性制约中解放出来。借用这一视角来观察非遗，则是那些曾经与特定村落、特定传承人、特定季节仪式紧密绑定的文化实践，正在通过数字技术获得一种脱离原生语境的存在方式。

3.1. 非遗记忆的载体转换：从物质到数字外置化

非遗记忆的传统储存依托于“物质－身体－仪式”三位一体的在地化系统，具体表现为，一是保存介质多集中在物理载体，如书籍、手工制品等；二是依赖于非遗传承者在特定的场域内通过口述、身体实践、重复性仪式等方式进行文化传承，其储存逻辑具有时空依附性与代际传递的脆弱性。如果说在技术还未像如今这般发达以前，非遗的依附还集中在人脑记忆，即依靠人们的共识和默认，那么现代数字技术已经将非遗记忆从人脑中解放，向数字记忆转变。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储存提供了全新的介质，传统碎片化的采录方式逐渐演变为智能化修复、挖掘和数字化储存，实现了存储方式的脱域化，使非遗记忆的传承从“在地”走向“在线”。首先，非遗记忆的修复和重建成为可能。人工智能凭借模型复现重构以及深度学习，那些未被收录或重视的边缘非遗记忆得以重新展现，一些濒危非遗技艺的记忆重新回归到人们视野中。如“京西太平鼓数字化工程”采用高精度 3D 扫描成像设备捕捉传承人的面部和手部细节以生成 3D 模型，利用 Artec Studio 等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优化，还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低分辨率音视频的 AI 数字修复，实现了京西太平鼓的情境复原和场景模拟。

其次，非遗记忆的形态、存储和模式也发生转变。事实上，就记忆存储介质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物质载体占据了文化记忆的核心位置，如博物馆、档案馆、纪念碑等，通过筛选边缘记忆、凸显核心记忆实现主流文明的传承。而近年来，伴随着人文资料的数字化和网络分享，包括非遗在内的人文知识的获取、分析、集成和展示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新的数字化场景。^[5]在人工智能与人文领域的结合下，记忆变得可复活、破译、加工、整理和传播，不同的记忆资源得以突破物质和时空界限，实现其文化内核的外显。基于数据化编码、语义描述与标注技术，能对非遗档案进行元数据描述，对非遗资源进行详细的数字化记录和分析，解决图像检索中的语义鸿沟问题。非遗数字记忆作为人文与科技的结合，实质上就是通过科学技术将文化记忆加以深度重构和长久留存的结果。

对于数字时代的记忆传承，英国社会学家霍斯金斯提出了一种“连接转向”的观点，强调了数字媒介在重塑社会记忆方面的关键作用。他认为，社会记忆的形态已经从传统的集体共享(collective)模式转变为网络连接(connective)的新型记忆模式。尽管非遗记忆的本质内核仍然是作为“原料”的人类头脑中的记忆及资源，但社会记忆框架已经并不仅依赖于传承人机制，而是将海量非遗记忆存储在云端，并可供后人反复研究和利用。通过数字记忆的应用，非遗也得以在持续的资源拓展和实时的互动交流中不断孕育新的记忆，同时对动态记忆进行全新的固化与存储，实现从静态保存到动态生成。再次，非遗记忆的生成也成为可能，新的记忆不断为非遗融入新的活力。相比传统的档案保存和口口相传等，数字记忆的应用将非遗传承的方法论从保存维度延展到了开发维度，并不局限于线性延续上，而是从记忆形式、记忆形态、记忆类型、叙事结构和意义生成等多方面拓展。借助深度学习算法，研究人员能够对数以千计的经典戏曲唱段音频样本进行系统性分析，构建出高精度的声学模型。如 OpenAI 的 Jukebox 模型即能够通过学习音高、音色、音强等声学参数的动态变化规律，生成高度接近传统音乐风格的旋律，使人们关

于戏曲的记忆不再是传统的，而是不断更新的。

3.2. 技艺释放：从原境依赖到独立传播

非遗的呈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非遗项目的接受和理解，譬如麦克卢汉就曾将媒介作冷与热两种形态的划分，前者需要受众投入较多的精力加以理解，而后者则不需要受众投入那么多自身的解读。传统的非遗传承讲求口传心授，需要传承者长期的学习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而当抽离非遗原生语境、面向并非长期浸润在非遗环境中的观众时，就只能依赖于文字、书籍、影片等载体，难以依赖原有形式进行有效的传达。并且，那些无法用既有形式呈现的非遗记忆就将会被隐匿。此时，非遗记忆的呈现和迁移是断裂的，即便它试图脱离在地的限制，但却因媒介承载力的匮乏而无能为力。观众也只是承担了被动接受的角色，并不能完整领悟到其内涵。一是在无法预判观众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的情况下，会导致传承效果十分有限且参差不齐，二是观众也难以跳脱出呈现形式所建构的框架去做其他解读，很难真正回到非遗形成和产生的原境，且部分晦涩难懂的非遗内容也无法通过更创新易懂的形式加以呈现。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深入发展，一些特定的、在地性的非遗文化实践正在被迁移至新的数字空间。与传统的文字或影像记录不同，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与三维传感技术能够将非遗技艺从传承人的身体和特定的仪式场景中抽离出来，转化为可独立呈现、可反复调用的可视化数字形态。在第八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观众可以通过电子遥控笔复刻景泰蓝的掐丝工艺，这一原本只能在北京的工作坊中、经由师傅手把手传授才能习得的技艺，被迁移到了任何一个观众都可以触达的展会现场。此外，观众还能在 AR 虚拟环境中感受“一日能看千台戏，三天能听万卷书”的马街书会，在特定时空坐标下的地方性曲艺盛会跨越物理边界；借助 AI 与 AR 技术实现“螭蚩女”变装，生成不同的京剧装扮等。可见，非遗的默会知识正在经历一种可视化转译。所谓可视化转译，是指那些原本储存于传承人身体记忆中的手感、力度、节奏等难以言传的知识，通过动作捕捉、三维建模与交互界面设计，被转化为可见、可操作、可复制的视觉符号，而这种转译本身就是脱域化的具体实现。它超越了原境的简单复刻，使非遗记忆得以摆脱特定身体与单一地方性的绑定，在更广阔的场域中获得自我叙述的能力。从海德格尔“世界展示”的角度看，这种技术媒介对非遗记忆的重构，实际上也是对“世界”的一种新的揭示方式。技术超越了工具属性，通过重新配置人与文化、人与记忆的关系，打破了地方性语境的封闭性，打开了一个以往在物理空间中看不到的“世界”。在这个维度里，非遗记忆跨越了特定的身体与地域限制，以一种更具开放性、交互性与生动性的方式，在云端与数据中获得新的生命。

3.3. 传播逻辑：从地域绑定到数字流动

新兴数字技术的出现颠覆了人、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前被认为是文化依靠某种技术媒介进行传播，现在俨然技术媒介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一种传播与文化。在人工智能、云端传输等技术出现以前，非遗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除了在非遗所属地的跨时间代际传承之外，非遗的传播以及演化都很难有所突破。当然，虽然电视、电影等媒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空上的限制，能对非遗内容进行记录和异地化传播，但其传播范围、动态生成、传播效率仍不理想。

传统非遗传播遵循的是创新扩散的线性模式，即从少数传承人向大众逐级扩散。人工智能技术则推动非遗传播逻辑向算法涵化转变。在人工智能媒介环境中，非遗内容从固定的时间表与地域框架中被抽离出来，变成可被算法识别、分类与分发的数字单元。传统的传播依赖于受众主动寻找或恰好身处某一地点，而算法涵化使得非遗内容可以根据用户的偏好、行为和互动历史，主动进入用户的视野。这一转变的本质是脱域，即非遗不再必须依托某个特定的节庆现场或某个固定的播出时段，而是被拆解为可独立流动的信息碎片，在数据网络中重新组合。

以“云南非遗过大年”AI追年地图为例，表面上看系统根据用户的地理位置推送当地非遗活动，似乎强化了地域属性。但重点在于，那些原本只存在于大理彝族村落中、只在特定节庆期间发生的打歌活动，已经被算法从原生仪式场景中抽离出来，转化为可预览、可检索、可触达的数字信息。用户不需要亲身前往大理，不需要等待特定的节庆日期，只需要在系统中点击即可获得相关信息。如当用户点击“昆明”时，系统会推送“昆明市春节期间非遗庆祝活动”和“大观楼灯会主要活动”等实用信息；点击“大理”时，则会展示彝族打歌宣传周、南街非遗旅游街区系列活动、平川非遗展示展演等重点活动信息。地理位置在此不再是传播的壁垒，而是算法用于匹配的一个标签、系统会根据用户的地理位置和浏览偏好，智能推荐相关活动信息。一个身处昆明的用户可以被推送大理的内容，一个从未去过云南的用户也可能因为浏览过相关民俗而被系统推荐。这时候非遗记忆便从固定的地域框架中被抽离出来，在算法驱动的数字空间中实现个性化的重组与流动，也让受众与非遗的相遇方式从被动的时空约束转向主动的算法匹配。

4. 记忆的重组化：参与式重构与情感联结

人们对非遗的记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过去故事来龙去脉的体认，即通过关联不同物件、不同时间、不同技艺之间的关系，将其组织成有意义的叙事，从而形成自己关于非遗的记忆框架。叙事活动自诞生以来，就与其传播载体密不可分。从口语叙事、文学叙事、影像叙事到当下数字媒体的叙事，媒体的表现形式虽各不相同，但叙事活动的本质未曾改变。叙事讲究遵循内在逻辑，以连贯线索编织故事，跟随讲述者步伐穿越时空，使受众沉浸其中。传统档案式记录叙事角度单一，难以承载非遗动态流变的生命本质，而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正在改变这一局面。通过推动叙事主体的扩展、叙事情感的激活以及叙事体验的具身化，重塑了非遗记忆的叙事逻辑。这一过程的核心正是记忆的重组化，即把原本分散、碎片化的非遗素材重新编织成具有情感张力和参与性的文化叙事，让记忆成为可以被不断重构、分享与再创造的意义网络。

4.1. 叙事主体拓展：从传承人到人机协同的叙事共建

非遗植根于特定的时空背景，它主要源自民间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与习俗，并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互动与交流中逐步构建起对其深层文化意义的共识。由此，非遗不仅是个体记忆中的一部分，更是群体记忆实践的生动体现。非遗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存储特性为异构资源之间的互操作提供了底层技术支撑，让人工智能技术得以使多重主体参与到非遗的叙事建构中，突破了以往由官方与专业机构主导的叙事格局。在这一过程中，自叙、他叙、官方、个人等不同视角相互交织、流动与转化，形成了传承人、公众与智能系统协同参与的三元主体结构，不同记忆面向得以融入到非遗记忆中，实现流动叙事中的意义再生产。例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LAM)在共同的数字化诉求下搭建起合作的桥梁，以记忆机构的名义发起“记忆工程”等项目或开展档案合作，共同致力于非遗资源的系统化整理、保存和传承。南京市档案馆联合南京大数据集团建成的南京云锦、南京金箔两大类非遗档案专题数据库，以及“金陵档案·兰台拾遗”应用系统；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城建档案馆等机构合作的“百年外滩 档案云游”项目；国家图书馆实施的中国记忆项目等等，这些承载人类文明记忆的机构都是通过“记忆工程”等创新实践，形成多维度的非遗保护共同体，系统推进非遗的数字化建档、智能管理与活态传承。

毋庸置疑，记忆的留存代表了人们对特定文化的认同程度，也正是因为记忆的建构，才使得民族的“根”得以延续和传承。作为非遗记忆传承的核心载体，“人”在非遗符号解码与再编码的循环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也是文化记忆实现增殖性流动最重要的部分。从记忆的共同体层面看，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社会集团所建构起来的，社会集团决定什么值得记忆，个人对公共事件的认同也在进一步塑造记

忆；滕尼斯用“共同体”概念意指一个“持久的和真正共同生活”的有机整体；康纳顿提出的“社会记忆”，则强化了记忆的社会性，即记忆并非个人现象而是社会现象。在时间与空间的流变中，记忆的建构始终与公众生活相联结，由公众构建、由公众传播、由公众再塑造。正因公众是记忆的承载主体，非遗记忆的重建与价值回归才需要公众的认同与共通心理体验的建立。

数字技术的浸润使公众获得了更多诉说非遗记忆的权利与机会，共同参与到记忆的塑造中。叙事权从制度化机构向全民参与转移，公共领域的形态因此被重构。在博物馆主导的传统非遗展示阶段，关于非遗的历史叙事常以宏大叙事掩盖微观叙事，个体的细节呈现被遮蔽，从而导致非遗记忆只是一条发展时间线，缺少了更为生动具体的故事表达。在技术支持下的非遗内容生产场域，用户生成内容(UGC)与机器生成内容(AGC)形成双向互构关系。一方面，非遗爱好者通过短视频创作、数字孪生设计等实践参与文化再生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工具则提供创作辅助与内容衍生，人机协同创作模式催生出新型的参与式记忆共同体。通过数字符号的交互仪式，集体记忆被不断重构，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具有自组织特性的非遗数字记忆生态。可见，传统的传承人-受众二元对立结构被数字技术解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传统文化权威的消解与重构，使得文化传承呈现出多向度、去中心化的特征。观众获得了更多自主权，作为对话者参与到非遗的理解与建构中。

4.2. 叙事情感强化：数字叙事中的符号化与身份认同

按照杰瑞德·库尼·霍瓦斯的观点，位置信息是重构记忆的线索。观者最深层次的记忆并不来自孤立展示的物件，而来自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叙事化关联。对应到非遗展示中，则是通过对非遗各个元素的选择、优化和安排，形成有组织的、结构性的叙事，以此调动观者的情绪、强化观者的记忆。在艾莉森·兰兹伯格看来，媒介技术能形成一种假肢记忆，其意义正表现在对情感的调动上，“它是真实体验的一部分，但这种体验依托于特殊的疗愈条件产生，具备临时过渡的性质。”[6]也就是说，记忆的运作方式实则是一种移情经历[7]，即使观者与某种历史事件并不处在同一个时空中，仍可通过体会其中的情感，内化并不属于自己的记忆。

在人工智能场景下，数字叙事的情感动员机制得到了显著提升。非遗的智能化呈现通过仪式符号的视觉强化与集体记忆的场景复现，能够激活受众的文化潜意识，唤醒情感体验，从而促使观者产生情感共鸣。具体而言，数字化非遗叙事常采用移情手法，将观众或听众拉入叙事的情节或场景中[8]，通过对某些叙事元素的凸显、放大、弱化或重新排列，在保留非遗本真故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充分调动观者的情绪与参与感。在2025年春晚舞台上，李子柒身着“蝴蝶装”，仅1秒的开场瞬间引爆社交网络。李子柒的华服融合了苏绣、缂丝、侗族亮布等13种非遗技艺，利用裸眼3D与AR技术同步呈现打铁花、剪纸等非遗元素，通过景别切换激活观众对非遗美学的潜意识认知，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这种将情感叙事融入舞台设计的手法，在非遗文化展示领域同样得到广泛应用。以四川非遗馆为例，其通过增设虚拟现实体验区打造非遗数字场景，并利用互动小游戏将孔明灯、绵竹木版年画、成都银花灯制作工艺等内容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这一方式不仅模拟了历史场景的真实体验，还构建了一个可移置的空间，使观者能够在多重数字装置中沉浸式体验历史场景，形成在场的情感记忆锚点。

4.3. 叙事具身重构：虚拟在场与沉浸式记忆场景的生成

从非遗的形成历史来看，它最初就是一种身体经验的知识，人们将行为模式沉淀在身体表达中形成记忆。保罗·康纳顿提出的身体记忆理论，通过“体化实践”这一概念揭示了集体记忆的动态生成机制，“体化实践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9]他认为，历史事件的意义并非静态存在，而是通过代际传递的仪式性身体动作不断重塑，如礼仪和操演。在非遗传承中，技艺、曲艺、习俗等依赖人的身体

进行承载和表演，同时其传承也需要将此种技艺传授给另一个身体，使非遗记忆得以在代际间流动。通过身体的重演行为，过去与当下形成互文性对话，集体记忆由此获得活态传承与空间化再现。梅洛-庞帝则将身体置于主体的地位，认为身体之于世界的关系是媒介，人们通过身体实现感觉和对象的相统一[10]。换言之，身体本身就是社会实践，人们通过身体劳作、体验、感悟、记忆，由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体衍生出独一无二的体验和记忆。

对于数字非遗而言，由技术建构出来的身体感意味着对身体的更高层次强调。从非遗的保存和传承来看，三维建模与动作捕捉等技术能够最大程度还原非遗身体实践的原貌，将身体的习惯性记忆突破肉身的限制，移植到数字空间中，通过建模实现对非遗内容的保存与呈现，为非遗提供一个智能的类身体记忆系统。从非遗的展示传播来看，非遗场馆的互动装置也将观者的身体纳入考量。通过点按、身体姿态变化或声音等方式，观者能与装置进行个性化交互，强化具身体验在记忆建构中的作用。例如在苏州丝绸博物馆推出的“织女传说”全息剧场中，观众可通过体感设备体验“天衣无缝”的纺织过程，将古老的纺织转化为可触控的数字剧场，非遗技艺的隐性知识从而转化为具身认知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具身也意味着一种更沉浸的“在场”。观者的身体体验和情绪随着装置的变化而变化，更深入地走入非遗的叙事中，并作为具有一定能动性的参与方完成对整个非遗叙事的建构，身体动作和情绪感受都构成了对纺织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5. 记忆的激活化：非遗时空的重塑与在场体验

传统非遗记忆往往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场景紧密相连，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印记，这种既是其魅力的来源，也是其脆弱的根源。一旦地域变迁或代际断裂，记忆便可能淡出乃至消失。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正在改变这一局面。通过对时间、空间与场域关系的重构，它不再只是保存记忆，而是主动唤醒记忆，使记忆从静态储存转向动态参与和体验。这一过程便是记忆的激活化，它让非遗从档案中走出来，从过去来到当下。具体而言，激活化体现在三个向度，即时间、空间与场域，这三个向度重新定义了文化传承中人、技、物、境的共生关系。

5.1. 时间延展：记忆的纵向堆积与跨时代对话

历史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沿着时间维度不断拓展和延续。这也意味着，非遗谱系同样不是静止的历史标本，而是一种在代际实践中延续与生长的生命体。每一次具身化的实践都构成了整个历史链条中的节点，节点不断生成与叠加，在时空维度上形成层累式的记忆网络。从时间结构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对非遗时间结构的重塑，集中体现在其特有的“叠写时间”机制。相较于物理世界的线性时序，数字孪生构建的虚拟建模系统允许不同历史维度的文化信息以超文本形态进行多维编码。超线性时空架构使非遗元素能够突破此时此地的限制，在虚拟场景中实现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织。非遗历程由此呈现出复合的时间结构。新的关键时间节点在不断生成，同一时间点下的非遗事件也在不断丰富，为召唤更为丰富的非遗故事留下了空间。

从时间的统合来看，人工智能技术促使不同非遗的时间历程变得明晰。非遗作为人类传统社会传承下来的文化，包含大量的传说、神话与口述，并不具有现代性所要求的精确时间，其衡量时间的标准也与当下的视角有明显差别，比如人们谈论时常用“那个时候”“以往”这类模糊的时间概念。一方面，数据比对、人工智能、深度挖掘等数字技术能通过物件分析还原当时的时间节点，更为精确地对非遗内容出现及发展的各个时间进行追溯；另一方面，针对非遗发展历程的碎片化和复杂化，也能通过智能化整合还原发展的原貌，将非遗记忆以更为清晰、时间感的方式呈现。例如“河南非遗一张图”项目，基于对河南省丰富非遗数据的检索、抽取与处理，可以从海量数据中精确追溯非遗内容出现及发展的时间节点，

比如确定某些非遗技艺在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致年代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时间，从而直观地呈现非遗的代际传承与地理分布范围，清晰还原非遗发展的原貌。

从时间的对话来看，跨代际记忆的对话机制得以建立。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针对同一非遗的不同时期的记忆与叙事被重新发掘。非遗的活态性本身就体现在其反映了动态的社会关系、历史背景以及当时人与人、人与空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的分布式时间轴平台，支持不同世代的传承人在同一数字界面上进行技艺修正与注解，推动非遗记忆从存储记忆向功能记忆转化。通过前沿的话语分析技术，能够对比不同时代背景下非遗的演变差异，并结合历史语境进行解读，实现跨时代的对话与理解。如云南的数字非遗区块链综合应用项目中的“数字紫陶”，就能为每件紫陶产品配备专属加密芯片，记录存证产品关键生命周期环节数据。不同世代的紫陶艺人可以在区块链的分布式时间轴平台上，对紫陶制作工艺在不同时期的特点、改进方向等进行标注和说明，实现了跨代际在技艺传承上的对话，也推动非遗记忆从单纯的存储向指导后辈创作的功能转化。

5.2. 空间扩展：从地理边界到虚拟共同体的记忆建构

非遗记忆中的空间维度主要从横向与广度层面展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空间”并非我们日常中所理解的某个立体的有界限的物理实体范围，而是叙事中所营造出来的空间感。加布里尔·佐伦在其著作《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构建了空间在叙事中的三个层次，分别是地志的、时空的和文本的，强调空间是一种读者积极参与的建构过程。其中“地志的”与现实中静态实体的空间相关联，包含物理空间中的方位概念，也可意指形式空间；“时空的”则包含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关系，前者指中任一叙事点上客体与客体之间的互构关系，后者指特定叙事的时间发展变化过程；“文本的”指语言文字所构筑的抽象空间，涉及语言的选择、文本的时序、视角结构等^[11]。如前所述，非遗的内容展示与传播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其构筑的叙事空间也体现了一套叙事者和观看者共在的认知系统，这一系统在数字环境下出现了新的转向。

数字媒介技术和终端设备改变了人们对非遗空间感的认知。基于全息投影、虚拟现实与数字孪生等技术，非遗展览可以在现实空间里构筑一个同时共存的历史空间。通过模拟非遗过去的生活化场景，包括装潢、人物、动作与制作过程，对历史场景进行复现，强化视觉效果，利用空间体验来调动记忆。在拓宽非遗文化空间感方面，科大讯飞与北京市文物局合作打造了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北京中轴线虚拟人交互平台”。该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与虚拟人技术，以AI虚拟人“周周”为核心，通过面向用户的实时对话，将中轴线文化以更加鲜活新颖的形式呈现给公众，使用户的空间认知维度从地理坐标转向文化意义网络。

事实上，除了现实中对虚拟空间的营造，非遗的抽象文本空间也得到拓宽。数字网络空间和移动终端突破了非遗传播的地域和时间限制，构建起“全球地方化”的记忆空间。在技术支持下的非遗内容生产场域，用户生成内容与机器生成内容形成双向互构。非遗爱好者通过短视频创作、数字孪生设计等实践参与文化再生产，人工智能工具则提供创作辅助与内容衍生，人机协同创作模式催生出新型的参与式记忆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叙事的地位逐渐凸显，作为与官方叙事并行的第二条叙事线索，反映出非遗更多的细节与真实形态，拓展了非遗记忆的文本叙事空间，让原本受限于物理边界的非遗记忆得以在更广阔的虚拟场域中被重新体验与分享。

5.3. 场域融合：线上线下混合空间中的记忆重塑

社会记忆通常需要依靠一定的中介加以寄存，如博物馆、纪念馆和遗址等线下实体场域，以此搭建国家的和民族的记忆叙事。在诺拉看来，社会记忆正是通过“场”为载体才得以萌生、凝结与延传。“记

忆之场”是一种具有符号性意义的场域，既包括如博物馆、文化遗址等的物质性场域，也包括带有象征性的抽象空间。在诺拉的观点中，记忆之场始终与民族、集体、象征等相连结，记忆不仅关乎储存，更关乎民族情感和历史意义。记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通过特定的场所、物品、仪式等载体被唤起和保存。非遗所依存的现实空间，无论是传统村落、手工艺作坊，还是民俗活动场地，都是天然的“记忆之场”，承载着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而在数字时代，非遗记忆的数字再现与数字空间的构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这种“记忆之场”。

在当今数字媒介生态下，万物数字化、云端化已成为常态，记忆也不例外，逐渐从“有限生产场”转向“数字生产场”。与传统非遗依赖的物理空间不同，数字技术将非遗记忆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记忆之场从物质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此外，混合现实技术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把虚拟的非遗内容叠加到真实空间中，让用户在同一个空间里既能看见真实的场景，也能与数字生成的非遗内容互动。用户可以通过手势这样的自然动作来触摸、操作或体验这些内容，身体的动作直接参与到文化实践中。以“大唐·开元”项目为例，其利用元宇宙技术复现大唐西市，将曾经辉煌一时的古代商业市集以数字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曾经只存在于史书和人们想象中的大唐西市的繁荣时期被具象化，跨越千年与现代观众展开对话，让人们对唐朝商业文化的记忆得以延展。从空间角度看，这一项目则是突破了遗址本身的物理空间限制，让更多人能够通过网络抵达，实现了记忆的建构与突破。

6. 批判性反思：人工智能下的非遗记忆困境

6.1. 记忆失落：技术逻辑对非遗本真性的侵蚀

在人工智能时代，云端数据库、区块链等外置化存储系统将口传身授的活态记忆转化为可量化存储的数字符号，数据因此成为记忆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可以像检索数据一样去检索记忆，不必真正经历记忆的形成过程就能确认记忆的内容。当然，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数据储存的精度、持久度都在提高，非遗记忆似乎可以“永久”地在数字空间中存储。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记忆的本质是社会成员共有的象征符号体系，其关键在于被社会成员铭记而非被技术永久保存，强调的是它在社会成员之中的留存度与认同感。记忆的形成是主体、客体与中介之间动态交互的结果，而数字记忆往往忽视了记忆的真正寄存者——人。尽管数字技术能够将记忆存储在虚拟空间中，但它无法替代人脑记忆的能动性和情感联结。

非遗作为一种承载民族情感的活态文化，其核心价值在于动态传承与集体认同。如果仅仅将非遗以数字记忆的形式存储，很可能丧失其文化内核，难以真正成为社会成员共同珍视的精神财富。在当前的数字记忆实践中，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记忆本质上仍是一种外挂式记录。数字记忆依赖于特定的技术设备和软件平台，一旦这些设备或平台出现故障或过时，与之关联的非遗记忆也可能随之丢失。例如，老旧的存储介质可能因物理损坏导致数据丢失，某些专有格式的文件可能因缺乏兼容性而难以打开。这样一来，当记忆载体从传统的具身化传承转向技术化托管时，元数据框架的引入会重塑记忆的分类逻辑，这很大程度上与传统记忆共同体的集体实践逻辑不相符，可能导致原生文化语境的淡化甚至消隐。另一方面，在算法驱动的记忆再生产机制下，非遗记忆的阐释权不再掌握在传承人手中，而是逐渐转移到数据模型，这可能使技术在记忆诠释中的作用被过度使用和神化。正如霍斯金斯所言，数字技术加重了记忆的二分法概念。与传统记忆面临消逝不同，数字记忆面临的是记忆的断裂。

6.2. 情感异化：数字化存续中的传播失真与意义流失

数字存储技术凭借高精度与大容量的记录手段，极大拓展了非遗记忆的表现形式，使非遗项目得以通过数字化方式长期保存。但数字化存储在提升技术效率的同时，也使得记忆的技术性逐渐跃居于原生

性之上。非遗记忆的生成与传承，本质上源于特定文化群体在历史中形成的具身化实践与情境性互动。无论是傣族孔雀舞、藏族晒佛节，还是陶瓷制作技艺、刺绣技艺，这些承载非遗记忆的活动原本就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片段。其中流淌着共通的情感脉络，代代传承，绵延不绝。而人工智能技术创造的虚拟展演空间虽然突破了物理限制，却难以完全还原这种情感联结。

在传统传承中，非遗记忆通常以仪式化的方式呈现，同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交流与集体参与。但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下，由于缺乏特定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背景，非遗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剥离。记忆接收的感官维度被简化为以视觉为主导的平面化体验，即使在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参与下，也只是一种模拟的手段。此外，非遗本身是不同地域文化与习俗长期演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在地化与区域化特征。在数字媒介环境中，人机交互界面在一定程度上过滤了文化实践中的情感温度。不同地域的非遗被置于同一个虚拟空间中，难以体现地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即使通过分类加以区分，观者也很难体验到地方的独特氛围，这可能削弱人们对非遗记忆原生态体验的感知。此外，流量逻辑驱动的数字化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将非遗记忆转化为可量化的文化资本。算法推荐的爆款内容往往存在情感简化与语境抽离的问题，形成了一种鲍德里亚口中的“超真实”拟像，导致非遗记忆的深度与多样性被稀释，在数字洪流中逐渐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

6.3. 权力博弈：算法逻辑与非遗记忆的选择性呈现

在数字空间中，非遗数字记忆通过对原生非遗记忆的移植与再组织而形成，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带有显著的选择性。换言之，非遗数字记忆并非现实非遗的完全再现，而是经过展示者有意或无意地筛选后呈现的结果。因此，记忆的呈现总是伴随着未呈现的部分。在过去，哪些非遗项目能被记录和被看见，往往由专家或机构决定。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后，技术的可呈现性成为新的文化权力坐标。

具体而言，可技术化的显性记忆在数字传播中获得了特权，而难以数字化的隐性知识则面临结构性遮蔽。尽管数字空间在理论上具有无限容量，允许信息的无限增量，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时间、注意力和资源等限制，展示者只能选择有限的非遗内容进行呈现。从具体的非遗内容来看，一项完整的非遗通常包含多层次的信息和细节，例如背景起源、物质载体、民间轶事、人物事迹及文化象征等。这些细节看似微不足道，却可能承载着推动非遗演进历程的关键动力。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非遗的电子化记录和储存往往难以做到每一个细节都覆盖。如此一来，不完整的信息呈现可能导致对非遗文化内涵的误解或缺失，进而对其原真性构成潜在威胁，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迁移与转译过程中的信息损失。与此同时，算法可见性机制催生了记忆筛选的隐性标准，形成了一种算法规训下的记忆政治。算法决定了什么样的非遗内容能够获得更多曝光，技术本身成为筛选文化价值的新裁判。这种选择性的呈现可能导致某些非遗文化被过度凸显，甚至沦为文化奇观，而另一些边缘群体的文化表达在数字空间中可能遭遇排斥，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7. 结语

非遗记忆作为人类集体记忆的核心构成，既是文化多样性的鲜活载体，也是社会历史脉络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关键基石。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革新了记忆信息的保存模式，并重塑了大众对时间、空间及文化的认知体系。在这一技术逻辑下，记忆的保存与传承逐渐脱离传统个体经验与集体实践的双重依赖，转而通过数字媒体、网络平台与智能技术实现跨时空存储、分布式共享与多维度重构。这一过程扩展了记忆载体的物质边界，同时将记忆的生成与重构嵌入到人机交互的实践框架中，形成了技术中介化与网络协作化的新型记忆生态。

然而，技术对记忆的重构始终伴随着传播权力的再配置。人工智能化进程在改变非遗记忆的存储形

态、传播路径与呈现方式的同时，也重新定义了谁可以生产记忆、如何分配记忆以及谁能够接受记忆。无论是非遗的数字化保存还是活态化传承，如果脱离了文化深层意义的诠释与人文价值的守护，就可能陷入技术的窠臼。应对非遗记忆的消逝危机，需要在技术介入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辩证平衡，构建一种以人为核心、尊重文化活态性与主体性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框架。非遗记忆的终极意义，正在于它作为人类文明基因的延续。只有将技术实践扎根于人文精神，在数字活化中保留记忆的温度与灵韵，才能实现从保存记忆到激活记忆的创造性转化，使非遗在人工智能时代真正获得向未来敞开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李白杨, 白云, 詹希旎, 等.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技术特征与形态演进[J]. 图书情报知识, 2023, 40(1): 66-74.
- [2] 易善炳. 人工智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J]. 科学·经济·社会, 2020, 38(1): 19-25.
- [3] 吕伟松, 赵庆寺. 当“技术文明”走进“文化空间”: 论数智技术参与下的非遗国际传播[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6): 31-40.
- [4] 邵鹏, 潘仲菁. 人工智能时代的记忆“新底座”——数字记忆基础设施的特点、发展趋势及其隐忧[J]. 中国编辑, 2025(1): 80-87.
- [5] 刘炜, 叶鹰. 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5): 32-41.
- [6] Landsberg, A. (2004) *Prosthetic Mem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Remembrance in the Age of Mass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20.
- [7] 曾一果, 凡婷婷. 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 视听装置系统与新记忆之场[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3, 45(1): 93-101.
- [8] 李峰.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叙事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
- [9]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24.
- [10] Merleau-Ponty, M. (201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Routledge, 146.
- [11] 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